阅《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后的一些随感

杨逢诜

[摘 要]作者根据在阅读《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时的一些随感，总结并试图提炼出一定的普遍规律，这些普遍规律集中在读书的方法论以及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方，包括读书和思考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政治-学术的关系等等；在文章后半部分作者则针对一些书中的具体篇目发表了一点微小的，不具有广泛意义的意见和看法，譬如毛在我国逻辑学发展中的作用。

[关 键 词]阅读；方法论；知识；知识分子；哲学；

[中图分类号]A841

在读完《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之后，我们发现：毛主席对于读书的热爱程度，以及其读书的数量和质量，不仅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平均水平，在世界诸国的政治领导人中也应算是居于前列。本书所列举的一系列实例，不仅仅涵盖毛主席的读书习惯和阅读偏好，也对于一些偏专业性质的问题，比如红学和逻辑学的地位，以及哲学上的一些争议，有一定的探讨——当然这种探讨是基于毛主席本人观点的一种复述，其中不乏晦涩难懂之成分。从这些实例中，我们不难抽象出一些较为普遍的规律，这些规律未必仅仅能应用于阅读，有时也能延拓到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方面。

一、读书的方法论：

**（一）边读边思考，阅读和思考相结合：**

我们强调要让阅读和思考相结合，有若干层次的原因。首当其冲地，无论对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而言，边阅读边思考往往是有助于我们的学习的，阅读过程中的思考有助于我们理解书中一些结论的推导、判断过程，从而使得我们更容易接受这些结论；其次，书本中的知识往往都是具有适用条件的——即使是真理也有它的作用范围，超出这个作用范围真理也要失效，阅读过程中的思考使得我们得以摆脱死记硬背或者断章取义这两个对于学习和阅读极不利的坏习惯，也能够避免我们对于书本知识的误解；再次，尤其是对于社会科学领域，同一个问题往往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书本上只能给出有限个可能性，而基于基本原理出发能否有其它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是否能导出更好的实践效果，没有基于阅读的思考，则是不可能想到的；最后，书本上的内容未必都是正确的，有些仅仅是一家之言，有些仅仅是一种推测，有些甚至和基本事实相去甚远，如果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人就会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而犯下一些本不该出现的错误。

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思考，只靠大脑是不行的，在适当的时候在书上或者在纸上做一些批注、注解，记录下在读书过程中的一些随想，可以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毛主席在他读过的许多书上都留下了大量的批注、勾画的痕迹，在有些书上的注解总量甚至超过万字。同时，在阅读过程中的思考绝不是天马行空地瞎想，这些思考一定是“脚踏实地”的，要基于一些公理、已经证实的结论或者书中的其他内容，瞎想不仅没有益处，对于阅读这个过程甚至有可能有害。

在读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疑问和质疑，应该大胆地提出来，而不是憋在自己的心里。这些问题一方面可能能够加深我们对于书中某些结论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能够将书中的一些细微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原则性的）错误分辨出来，而后一个方面在社会科学领域则体现得尤为明显。毛主席在读书，尤其是读哲学著作时，常常会对于某一些表述提出质疑。这些质疑，有的解决了，有的仍然悬而未决，而有些质疑则带出了对于一些哲学观点的讨论，进而则延伸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上——也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分析以解决中国问题。

最后我们有必要指出，我们读书决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要参考作者的思考和研究方法，选取其中合适的部分为我们所用。如果我们将读书和获取知识划等号，那就显得有一点狭隘了——学不到研究方法，即使学再多的知识，我们也无法产出新的知识和方法为后人所用。

**（二）读书要和实践结合到一起：**

在探讨认识和实践、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则常讲，“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确实，我们学到了再多的知识，学会了再多的研究方法，不去做一点实事，那这些知识也仅仅只能停留在我们的大脑里而无法发挥它们的作用，那我们累死累活地学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呢？以机械工程这一一级学科为例，我们学到的这些设计理论、制造理论，最终一定是要为大工业生产服务的，如果这些理论不能产出一些实际的工业制成品，那我们还学他干什么呢！而有的知识和认识，如果不去亲手操作一下，恐怕很难凭空想象/死记硬背出来——比如在绘制零件图和装配图的时候，如果单看书本，某些规则和某些画法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结合上机械加工的一些实操经验，这些画法则相对地显得稀松平常了。

实践到底有多么重要呢？毛主席自己讲道：“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做周密的调查，是了解情况的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1]他认为在社会中进行调查“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这绝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毛泽东思想的早期产物——《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是毛主席本人进行实地调查，“开调查会”之后的产物。而在文化革命运动时期，当毛主席已经少有时间、精力作社会调查的时候，他本人反而产生了一些较有偏颇的、不那么合适的观点，这大概也算是一个旁证吧。

当然，读书和实践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过分强调实践，不读书、不接受指导就去搞实践，那是瞎搞，是要闹笑话的——有时甚至会导致一些不必要的损失。毛主席每到一地考察，必定要读一些与当地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等等有关的书，预先了解一下该地区的基本情况，以避免调查的时候两眼一抹黑的情况出现。

二、知识和知识分子：

关于读书，我们自然会想到知识、研究、学术和知识分子。在《读书生活》一书中，反映毛主席与学者、研究人员、党内理论家之间的讨论的篇幅也占据了本书相当的部分。毛主席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分析和学习的——毕竟一个能取得学界人士认可的政治权威并不常见。

**（一）学术和政治：**

基于一种传统的、西方化的观点，我们一般认为学术和政治应当是分开的，也就是所谓的“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因而在实践中我们会极力避免政治人物（尤其是政治领导）参与到学术讨论和学术研究中。这种做法有它一定的内在逻辑：政治人物在参与学术研究时被认为有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倾向，也就是说会有将“对不对”这种事实判断问题转化为一些具有政治性的，例如“能否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问题。这样就会扭曲学术研究的目的，对于学术研究的结论产生也是有害的（如，上世纪50-60年代对于马寅初《新人口论》和计划生育观点的批判，则是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一个恶果）。另外地，在西方的语境下，人有天然的屈服于权力的倾向，因此政治权力的介入可能使得研究目的、方向和结果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有时对于研究本身是有害的。然而，在阅读《读书生活》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毛泽东主席作为中国的最高政治权威，不仅没有回避学术讨论，甚至积极地参加到一些学术讨论之中。这种情形的实现，有赖于毛主席对于学术和政治之间分野的有效把控。

这种学术-政治界限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毛泽东主席在极力避免政治权力对于学术界的介入，也就是说，避免利用政治权力压制学术上的不同声音。我国在遗传学领域曾经受到过苏联李森科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政治上亦有所体现。在毛主席得知国内有学者因为与李森科持不同观点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他亲自过问此事并要求相关领导更正错误。在逻辑学界预备出版论文集时，他也没有反对发表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论文，甚至要求在发表论文集时采取“一批一驳，依次展开”的方式组稿。毛主席也多次强调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学术上反对搞一言堂这一套。

其次，毛泽东主席在参与学术讨论之前，往往都会学习相关领域的一些知识，或者说曾经已经对该领域有所了解，从而在讨论的时候能够“用学者的方式思考”，尽可能地避免“外行指导内行”的情形。毛主席对于自己相对了解得多的那些领域，如哲学、逻辑学、文学，学习得比较充分，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在这些领域，他常常会和国内的一些学者、党内理论家展开讨论，交换意见；对于红学之类的学科，毛主席了解得则相对地没有那么多，发表的意见也就少一些；而对于他不熟悉的自然科学领域，他则坦承自己是“门外汉”，反而会向那些专业技术人员讨教（如哈工大机械系的同志）。当然，在自然科学领域，他也发表过一些意见，但是这些“意见”也仅仅是作为疑问、建议而非观点出现的。

**（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从经济建设，尤其是从农业和工业的建设上来看，自然科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毛主席而言，他本人不仅坦诚地承认自己“对于自然科学和工业一无所知”、“略懂一点农业，但是对于农业的专业技术，就一窍不通了”，而且也对于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认真学习自然科学表示遗憾，同时还建议自己的孩子在苏联要“多学一些自然科学”，“稍微成熟一点之后再多学一些社会科学”。

从我们理工科的角度来讲，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我们会采取以下的表述：“不能只研究自然科学，也要懂一点社会科学”。而对于毛主席而言，他对于这一关系的论述则会恰好反过来。这与我们看待这一关系的出发点有关。我们这些理工科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和研究方向，基本都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领域之内，我们的视野就会受到它们的限制，因而要学习一些社会科学；而对于毛主席而言，他所熟知的一些领域，如哲学、政治学、逻辑学、军事学，则都应当归于社会科学之范畴。但是对于治理一个百废待兴的农业国而言，发展工业又是一种刚需。此时判断何种工业应当优先发展、应当在何处布局、如何发展，都会涉及到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知识。因此，在自然科学上面的一些欠缺可能使得在治国理政方面走一些弯路，付出一些不必要的代价。因而毛主席认为自己有必要“懂一点自然科学”。只懂社会科学或者只懂自然科学，都会对人的视野造成一定的限制，从而使得人有可能作出一些荒唐的决策（文化革命运动期间有很多这样的实例）。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二者之间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看，自然科学的发展带动技术进步从而实现经济基础的发展，这样会使得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改变，从而可以进一步推动经济基础（包含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如果一定要从本书中举一个例子来印证的话，我的第一反应则是毛主席从哲学上提出的“物质无限可分”原理对于我国的微观物理研究的影响。在毛主席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物理学家提出了一个类似于夸克模型的“层子”模型，而这一猜测也为外国同行们的实验所验证。毛主席的这一思想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在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格拉肖在发表演说的时候提出：“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作为一名理工科学生，我个人认为毛主席的这一思想从物理学的角度上看的确有些异想天开，但是它却能够被实验所证实，这也许就是社会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的一个影响吧。

**（三）关于知识分子：**

通览全书，我们不难发现，毛主席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是谦恭的、审慎的，也是严肃认真的。但是为什么在其他一些文献的记述中，一些知识分子在建国后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学习科学文化也被视为可耻的呢？这也许与一些对于毛主义的误解和曲解有关，而这些曲解和误解也极大地影响了一些基层政权和革命群众的认识。

如果我们依照阶级分析法作分析，我们一般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是以一个独立阶级的形式存在的，而是要依附于、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在上世纪初直至上世纪中叶，由于国家的长期贫困和严重的贫富分化，无产阶级——工人、贫雇农，包括下中农和部分的中农，仍然是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并没有足够的资本来使自己的子女完成学业。因而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有机会接触教育、接触知识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仍然是以富农、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子弟为主——即使是毛主席本人也是湖南一个富农家庭的长子。而正是这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发生了阶级的分化。他们中的大部分，自然而然地会依附于自己曾经所属的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最终与无产阶级之间产生了尖锐的阶级矛盾；而剩余的那一小部分，则在走向基层，与无产阶级人民大众进行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地同情、拥护无产阶级。这种分化和对立尖锐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主席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教授和学者们对我十分冷淡”，胡适也对这位图书管理员颇有微词。

基于这种对立关系，我们不难得出，在新中国的对资产阶级的改造过程中，大部分的原本依附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应当受到改造，而这种改造则主要以思想改造为主。当然在那个历史时期我们确实是这么做的——包括50年代中期的整风运动和后期一些较为激进的措施，如五七干校。而对于当时普遍的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众，很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就是“知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考虑到当时阶级斗争的叙事环境下，“无产阶级的一定是好的，资产阶级的一定是坏的”这种观念相当流行。这一系列的有偏颇的、不正确的观念最终导出的结论，则是“知识分子是坏的，学习知识是不好的”，而这种观念在文化革命运动期间则尤为盛行。

这一种错误的提法并非毛主席的本意——他并没有公开发表过这种观点。相反地，毛主席向当地重视知识的学习，无论是自然科学知识还是社会科学知识；同时，相较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主席更希望中国出现一批无产阶级的、工农大众的知识分子。基于此，新中国不仅开办了大量的识字班、扫盲班来扫除文盲，同时也在逐渐地兴办义务教育，来向普罗大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某些）知识分子的骗。”此话正有此意。

三、关于《读书生活》其他内容的一些随想：

《读书生活》这本书的内容繁杂而非拘于某一狭小范围，所以在提炼、抽取一些概念性的结论的同时，在阅读各不同章节的时候，我本人又会产生一些与本章节内容相关的一些想法和随笔，它们似并不能概括入一般性的原则，因此我单独地将这些内容拿出来单列。

**（一）关于逻辑学：**

对于逻辑学而言，从初高中起，我们的看法则一直是“逻辑学本身只是一个工具，它本身和科学一样不具有善恶之分”，而我们对于这种看法深以为然以至于我们并没有思考这一说法的来历。直至读到这本书之后我们才得以意识到逻辑学本身作为工具的地位是花了很长时间很多人争论出来的一个结论。在今人看来是显然的一个结论再过去居然是“不可理喻”的一种结果，这确实很出乎意料，但是细细想来却发现这似乎又是一种常态。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上世纪30年代苏联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看法，“形式论理学（逻辑学）是形而上的，唯心的，是一种错误的学说”，似乎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刚刚引入逻辑学数十年的新中国而言，似乎又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去否定这种说法。如果我们不加批判地接受苏联学派的观点，这恐怕会使得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拖慢一截。幸而周谷城、王方明等学者对于这一看法的反对意见没有被压制而是被摆到了台面上，否则在绝大多数人支持“苏联观点”的当时，这种错误的思潮又会使得我国走许多弯路。

当然这也有一定的巧合在里面——毛主席在阅读苏联的哲学教科书时也在进行思考，对于苏联方面的一些说法提出了怀疑。如果毛主席也原模原样地照搬苏联学说，后果会是怎样，我们仍未可知。但是必须要承认的是，毛主席对于我国逻辑学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关于政治经济学：**

《读书生活》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一篇，对于毛主席的许多政治观点作出了一些解释，包括一些正确观点和错误观点的解释，本文的许多描述都和课本上的表述相似或者相仿，不过相较于简明一些的课本而言，这本书里面对于毛主席的整个思考过程作出了一些详细的表述，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容易地理解《概论》课本上的许多表述（从而可以脱开死记硬背的怪圈）。不过本文里面的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革命的一些表述，确实震撼到了我，修正了我对于共产主义的一些片面的看法——从一些庸俗的观点看，共产主义似乎已经达到了一种“尽善尽美”的状态，不需要改变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毛主席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确实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但是对于部分质变论，我本人确实还有一定的疑惑。如果说一次质变可以分为若干个部分质变，那么一次部分质变是不是又可以分成若干个部分“部分质变”？那这样分下去是不是可以无穷无尽的分下去呢？这种“无限可分”的表征，使我我个人感到十分迷惑。

**（三）关于文学作品：**

对于鲁迅的作品以及《红楼梦》，我本人在高中以前的学习生活中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仅仅将这些作品作为故事去看，很少关注这些作品的政治和历史价值。《读书生活》一书使我对于这些作品的政治和历史价值有了全新的认识。鲁迅文章的战斗性和深刻性使得毛主席与鲁迅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共鸣。毛主席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推崇和尊重，以及毛主席对于鲁迅作品的大量引用和化用，恐怕也是后来鲁迅作品得到推广，为中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于红楼梦而言，毛主席对它的思考则主要集中在与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争议层面而非政治方面——也是体现了一种“百家争鸣”的思想。

**（四）关于哲学：**

《读书生活》中花了很大篇幅来记述毛主席对于哲学书籍的阅读和思考历程，我所以为的那些“晦涩难懂”的一些小节也主要集中在这一部分——毕竟这几篇文章涉及到了一些较为复杂的哲学理论。其实从本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毛主席在哲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对于党和毛主席而言，基于革命实践的需要，纠正党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是相当重要的，而这种“纠正”则需要基于对于马理论的更加深刻的理解，否则则难以纠正这种看似“从马列经典出发”而与马理论原则相悖的一些片面观点。当然，毛主席对于其他方面的哲学也有所涉及——包括我国古代的哲学——这也是出于对群众工作的需要。

如果要我从《读书生活》中的三四篇关于哲学的文章提炼出一个主题，那我则会毫不犹豫地想到恩格斯的那句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毛主席对于哲学类书籍的阅读、批判、注解、评论、推广，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非曾经的“本本”上的僵硬结论作出的。这种批判性的接受、学习模式和辩证的思想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很长时间。

参考文献：

[1]龚育之,逄先知,石仲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86.9:265-267.